

文学批评与

中国文学史的生成

蒋述卓 龙扬志 主编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非外借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文学批评与

中国文学史的生成

蒋述卓 龙扬志◎主编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史的生成/蒋述卓, 龙扬志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668 - 2237 - 6

I. ①文… II. ①蒋…②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②I2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6477 号

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史的生成

WENXUE PIPING YU ZHONGGUO WENXUESHI DE SHENGCHENG

主 编: 蒋述卓 龙扬志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陈绪泉 杜小陆

责任编辑: 陈绪泉

责任校对: 刘雨婷 叶佩欣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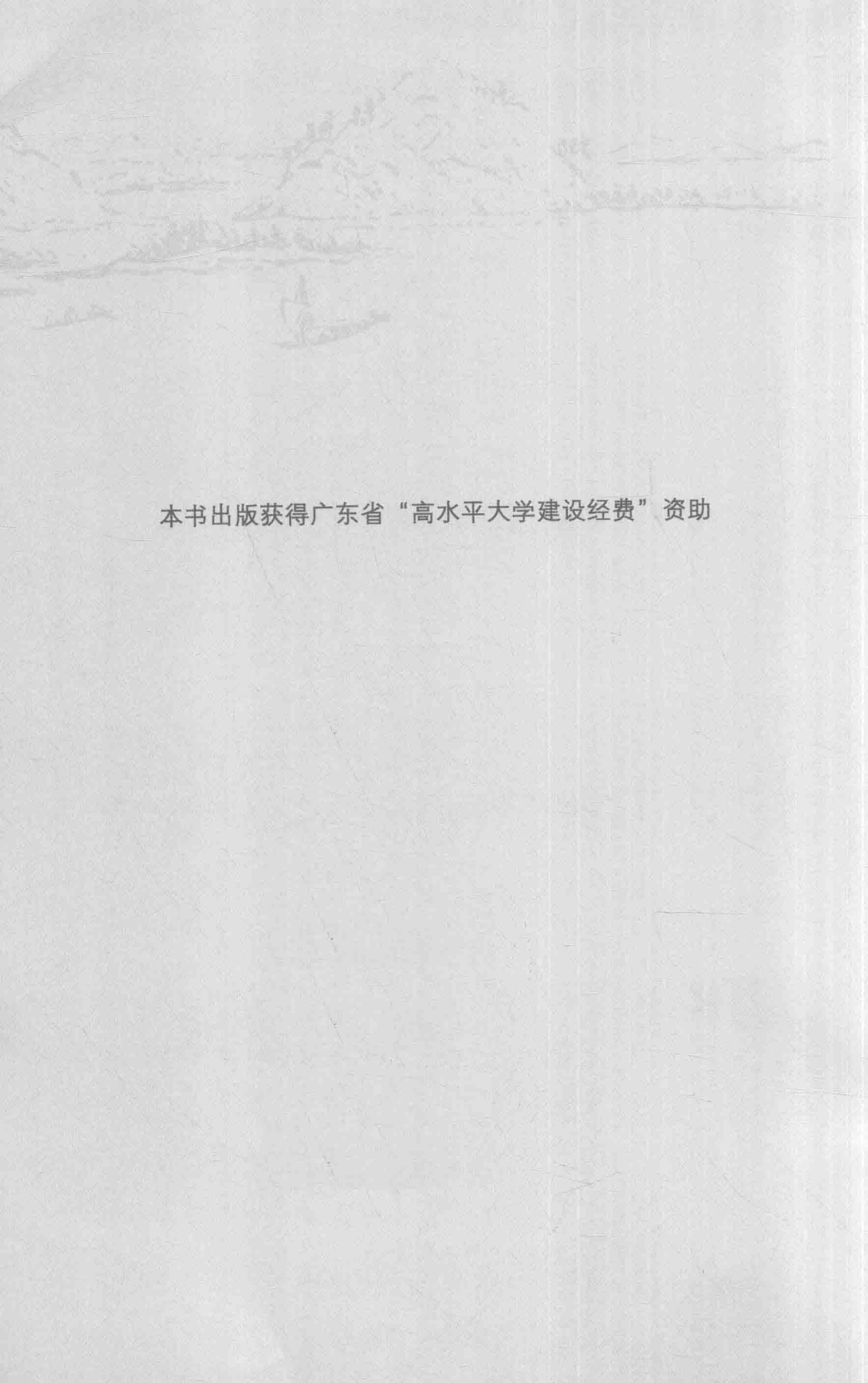
字 数: 412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

定 价: 7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出版获得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

文学批评推动文学史的生成（代序）*

蒋述卓

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筹备已久的“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研讨会今天开幕，衷心感谢各位在异常繁忙的5月抽出宝贵时间，来到暨南大学出席本次研讨会。我谨代表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和合作单位向出席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016年是中国新文学发生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走过的沧桑历史和复杂历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意义。

从学术研究史的角度说，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先生的对话。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在问题与方法的展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此，如何在“新文学百年”这样一个重要节点上清理相关学术问题，意义尤其深远。

我个人认为，过去三十多年来关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努力使文学史的观照回到文学的本位，具体地说，是以作品中心论完成对作家中心论的替代，这样一种转换带来的观念变革是巨大的。它为经典作品的遴选提供了可能，更加重要的是，突破了如作家出身、阶级等这样一些容易标签化的局限，使评价体系变得多元化，使个体能够发出真诚和真实的声音，这是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今天能有这么繁荣的学术研究局面，其实就是受益于洪子诚、温儒敏、黄子平等学者，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当然，作为知识对象的文学史，与作为情感对象的文学史是不一样的，前者让我们热爱理性，后者让我们的研究工作充满人性的温情。实际上，学术史的生成与同时代的批评总是分不开的，文学评论如何影响文学史的格局，二者之间无疑充满互动与塑造、对话与妥协、冲撞与规训，这些专业问题留给各位探讨。

* 本文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主任蒋述卓教授在“文学评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研讨会上的开幕致辞，题目为编者所加。

在广东生活了三十年，我也留意到广东这样一个地方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不论是从广东走出去的学者，还是在广东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他们发出的声音总是能切中时代的脉搏，体现出优雅的风度和得体的尺度，这可能与广东这样一个沿海省份的开放姿态密切相关。不然，我们又怎么解释从岭南走向世界的容闳、丘逢甲、黄遵宪、孙中山、梁启超等这样一些开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呢？丹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环境对观念的影响，而环境既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指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塑造，也会影响到学术环境的生成。

比如暨南大学重要的华文文学研究，其实就是与广东海外华侨华人的广泛分布密切相关，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化，文学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也就产生了关注华文文学的学者。加上暨南大学是一所以面向海外华侨华人为主的高校，研究华文文学也就拥有地缘、血缘和文缘优势。海外华文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参照，对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思路和视野的扩充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作用。饶芃子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暨南大学建起了完整的学术团队，目前还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这次会议由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联合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羊城晚报》等单位举办，我们这个基地是2015年申请获批的，成立以来我们既开展了很多具有学术建构的高端学术会议，也进行了一些文学和文艺现象的探讨，主要是想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尝试做些打通学科边界的工作。同时趁此机会，表达我们基地和我个人对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朋友发自内心的感谢。

最后，我祝愿大家在暨南大学交流愉快，也祝愿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目 录

文学批评推动文学史的生成（代序）	蒋述卓（001）
------------------------	----------

粤派批评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洪子诚（002）
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	
——在“文学批评与 20 世纪文学史的生成”研讨会的发言	
.....	黄子平（006）
提倡“文学生活”研究	温儒敏（010）
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	
——用《文心雕龙》“六观”法析评白先勇的《骨灰》	
.....	黄维樑（014）
“粤派批评”已是一个客观存在	陈剑晖（025）
“粤派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	古远清（028）

文学史书写

五四新思潮一百周年随想	林 岗（036）
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	
——《北方学者对于大众语各问题的意见》辨伪及其思考	
.....	付祥喜（041）
现代左翼文学传统的当代演绎与变迁	
——《百合花》再解读	傅修海（059）
中国文学图文互文研究著作的编纂历史与现状	龙其林 钟丽美（072）

“民族形式”谁主沉浮?

——20世纪50年代初内蒙古文艺“民族形式”

讨论考察 姚新勇 孙 静 (096)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分歧、陷阱与重建 张 均 (116)

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

——结合《文学评论》对文学批评文章的刊用

标准和风格来谈 刘 艳 (125)

文学史的文化视野

近二十年来的当代文学形态学研究

——以“十七年小说”为对象 曾令存 (144)

“文学文化史”观念下的中国文学史写作

——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李俏梅 (156)

“历史”与当代文学史叙述 杨汤琛 (163)

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逻辑

——张旭东“鲁迅重读”的比较视野与批评方法 郑焕钊 (175)

拉美文学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 滕 威 (187)

梅山文学：地方经验与文学史空间维度的生成 龙扬志 (198)

论20世纪40年代美华文学的发展及转变

——以《华侨文阵》《美洲华侨日报》《新苗》等

为考察对象 李亚萍 (212)

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离散写作与全球化的挑战 池雷鸣 (226)

蠡测与评议

为史需严谨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勘误 宋剑华 (242)

沙上筑塔，岂可安稳？

——简评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贺仲明 (261)

论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与 90 年代以来的知识转型	陈培浩 (272)
一部广度与深度兼备的当代诗歌史	
——关于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	王士强 (299)
当代文学史重构背景下的刘再复个案研究	吴小攀 (304)
学科之外，整体之中	
——陈思和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颜 敏 (315)

诗学批评

先锋诗歌批评与当代新诗史建构的偏至	罗执廷 (328)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	苏文健 (339)
论粤东诗群的地域特征	林馥娜 (349)
独自吟诵：作为存在者的东荡子	世 宾 (353)
打开更广阔的诗世界	
——2000 年以来新诗写作的一些面向	赖或煌 (361)
呼唤新的学院批评	
——“文学评论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生成”大会总结	
.....	杨匡汉 (373)
编后记	(377)

粤派批评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是研究文学史的，自然要阅读、处理各方面的庞杂材料。我也编过供教学用的当代文学史料选，编过“20 世纪中国小说理论史料”的当代卷，但没有专门做过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对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说不出什么来。这里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还做得不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16 年年初，在一篇谈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文章中，我引了张旭东的一个说法：俄国文学第一次提出“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时代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历史时间差及其克服的问题。俄国文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问题贯穿 19 世纪末和整个 20 世纪，并延续到今天。渴望创造“当代”的时间，在我们这里，既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实在发生的文学现象。

在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上，现代文学在这方面有深入开展，包括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流派、文类、具体作家作品等。十多年前，严家炎先生曾主编“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 11 卷，分别讨论宗教（佛学、基督教文化、穆斯林文化）、世纪末思潮、科学、现代都市文化、浪漫主义、抒情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都是从思潮的方面来检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关联。不过它们大多处理的是 20 世纪前半期的文学，当代文学部分涉及尚不充分。

如果站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或许可以做外部和内部的区分。所谓外部（或者外围），指的是将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不直接处理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与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关系；研究者也主要是外文系、所的学者。这方面的成果，包括资料

整理，新世纪以来颇为丰硕。整体性论述和大部头丛书，我知道的有龚翰熊主编的《西方文学研究》（2005）、王向远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2001）、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0）》（2011），还有申丹、王邦维总主编的、共8卷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2015）。

比较起来，杨义担任总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从近代卷到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就更多关注翻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就是将文学翻译看作是参与中国文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撰述者都是现当代文学学者，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自然不及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却能更多观照中外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层面。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关系密切。文学创新、文学改制、文学秩序确立，与翻译都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离不开翻译的推动，离不开外来影响产生的冲击。另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也让人印象深刻，如滕威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接受研究。在诗歌方面，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新时期以来外国诗歌翻译与新诗潮关系的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

总体来说，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开展还很不够。目前编纂的当代文学大事记、专题史料集以及带有某种史料编纂性质的编年史，这方面的表现都相对薄弱。

当代文学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在资料整理和研究的范畴、方法上，整体应该和现代文学并无不同，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或者特殊性。一方面，文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密切，包括“二战”后两个阵营的冷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等。另一方面，由于当代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性质，外来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潮、观念、艺术方法上，而且也体现在制度、文学管理和运动开展方式的层面。这些制度性因素，现代文学时期没有这么突出。还有一点，在当代，中外文学交流的方式、渠道，也呈现更复杂的状态。有正式的、公开的渠道，也有非正常的方式，譬如我们熟知的“内部书”“内部刊物”“过境影片”等。有的时候，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批判性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效应，也常常出乎设计者的预想。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基于扩大政治影响的考量，我们会邀请一些西方进步的左翼作家艺术家访问中国，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如同20世纪30年代苏联邀请罗曼·罗兰、纪德访问苏联那样。不过效果有时候也出乎意料。例子之一是“文革”期间对安东尼奥尼的邀请和随后对他的纪录片《中国》的大规模

批判。

我们都熟知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但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却差强人意。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夏中义先生的论文《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印象很深刻，可惜这样的研究不是很多。现在看到的研究专著，还是荷兰学者佛克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其研究基于大量资料整理之上，虽然评述的时间范围是1956—1960，对象主要限定在文学理论、文艺政策层面。这本书的英文版面世是1965年，40多年后的2011年才有中译本，放在程光炜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里。我们作为“当事人”却没能写出有分量的著作。

另一个问题，是西方及俄国18、19世纪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情形。有一种看法是，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发生紧张关系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其实，以19世纪现实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学，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关系也相当紧张。它虽然是可以用来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旧时代社会制度的资源，但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个性，对颂歌性质的文学的建立也是威胁。当代开展的对现实主义作家的重新阐释，还有对《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批判性讨论，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代文学的发展深深嵌入世界政治斗争之中，这方面的史料整理也大有可做。如20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大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对一些中国作家产生的冲击。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苏联分裂公开之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纲领”的批判，是当年中国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一些国际性政治、文化机构，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也有重要影响。比如1950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这是冷战时期主要由苏联控制的“统战组织”。它当然不仅限于文学范围，还涉及工会、妇女、青年、科学、体育、文化、教育、宗教等广泛领域，而且在文学领域也有相当影响。中国文学机构和作家通过它组织的大量活动，参与当时冷战角力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观察世界的方式，不仅与苏联，而且与西方左翼作家、知识分子建立了广泛联系。这方面产生的效应还需要在资料整理基础上做进一步考察。比如通过“世界文化名人”的年度评定，让一批西方古典作家名正言顺地在当代中国“落户”，并扩大中国与西方左翼作家（阿拉贡、艾吕雅、毕加索、萨特、波伏娃、聂鲁达等）的联系——而他们的文化/文学观念显然不能完全归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机构是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成立于1958

年10月，第一次会议在当时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举行，在科伦坡设立常设事务局，秘书长是森纳雅克。我写《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1962 大连会议”部分，说当年茅盾曾犯过政治错误，就是他在“世界和平裁军会议”上，支持苏联而排挤亚非作家会议秘书长森纳雅克。亚非作家会议20世纪60年代又举行过多次会议。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1961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和1962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会议。后来由于中苏分裂，该机构也发生分裂。在成立之初，它的宗旨是团结亚洲和非洲作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并在斗争中产生自己新的文化/文学。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国一些作家的活动、写作，如杨朔、刘白羽、林林的散文，冰心的《樱花雨》，巴金的《来自镰仓的照片》和他写井上靖、中岛健藏的散文，都和他们参加亚非会议活动有关。目前，对这个组织和当年开始的建立亚非“新文化”的设想，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关注的学者不是很多，较少被人提起，好像只有关注东亚政治/文学问题的学者，如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等少数学者有资料整理和论文发表。

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

——在“文学批评与20世纪文学史的生成”研讨会的发言

黄子平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作“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一次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所以必须诚恳，要尽量作诚恳状。

还是从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说起，可能在座各位都会经常遇到。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中文系的，而且是做当代文学的，就会问你一个问题：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呀？如果是三十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因为我一年365天都在读当代文学、当代小说，我有这个资格。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倒过来，经常问人家：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呀？结果反应是什么呢，这些老朋友都颇有一点自豪地说：“我早就不读什么小说了！”所以现在通常都是靠学生给我推荐。这是一个很值得反省的问题。这些做当代文学的“坏人”变老了以后，居然都不读当代小说了。

还有另外一件跟这相关的事情，若干年前，我跟上海的一个“70后”作家聊天——我很讨厌“70后”这样一种分类的标签，但是我们策略性地先用着——这个作家很困惑也很直率地说：“你们这些批评家为什么不再评论当代小说了？”他所说的“当代小说”，就是他们“70后”作家们正在不断生产出来的那些小说。我反省了一下，我好像也就只读到莫言、余华、苏童为止，后来的就不太读了。也不是完全不读。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理由来回答这位作家——就是这个题目。

你们“70后”的作品，应该由“70后”的批评家来批评。当年茅盾写《鲁迅论》《冰心论》《丁玲论》，对象就是他的同时代人。严家炎老师批评柳青的《创业史》——作者也是他的同时代人。回顾我自己写评论、写批评的

* 本文据黄子平先生发言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审阅。

缘起，也是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叫作“早晨社”。早晨社里面有几位小说家，写出来的小说——我当时还忝为早晨社油印杂志的主编——看了后很兴奋——欸，这个小说真好，“有划时代的意义”，激动起来开始写评论。这个就是批评的产生、批评的生成。这里很重要的因素是文学社团，文学批评产生于社团“内部”和社团“之间”。“社团”就是说，这些人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有话要说，对于他们这个社团里的同伴们的作品，有一种推崇的欲望和冲动。——文学批评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看一看当下文学现状的话，就会发现，诗人们、诗歌界的批评比较好。因为诗人们成立诗社，发表诗歌宣言，他们真的有主张——什么样的诗才是诗，什么样的诗是好诗，什么样的诗是纯诗，他们有很强烈去主张的观点。“别的诗都是烂诗，根本就不是诗”，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理论一套套的，很多概念日新月异地发明出来。所以，在别的文体的批评比较衰落的时候，诗歌批评是比较发达的。如果别人不批评，诗人自己来。批评的产生跟它有这样一种主张是有关系的。小说家就比较可怜，也没有人成立什么“小说社”，提出什么样的当代小说才是“真小说”。小说家茫然四顾——这些同伴们都干吗去了？考研究生去了，对吧？研究生面临的最重要的困境——老师不让你做同时代人的批评，以前更惨，要做逝世多年的像鲁、郭、茅、巴、老、曹这样的作家的研究。如果你不小心做了一个还健在的作家的题目的话，只能天天做梦，梦见这个作家的作品畅销，我这个题目也“合法”了。所以这些人到了学院里头，跟着导师，当然不能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只能做“研究”。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读完博士后读博士后，基本上这个人就傻掉了。所谓“傻掉了”就是失去了对同时代人作品的敏感，失去了对同时代人的文学主张的坚持和冲动。小说家孤独地茫然四顾，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也没有人拍手叫好，更没有人指出来哪些地方还可以写得更好。那么，他靠什么呢，靠两个标准来评价自己的作品好不好。一是文学评奖。文学评奖多如牛毛，学者是以长江大河高山巨岭为标签，评奖是以各地大大小小的已故作家来命名（施耐庵、蒲松龄、吴敬梓、冰心、萧红、叶紫……），评奖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有意见。这是一个标准。二是畅销书排行榜，看谁卖得多。小说家写出小说之后，就靠这两个非常不靠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好，是不是跟这个时代、跟这个同时代人之间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可能性。

我自己觉得我这个回答非常圆满，能自圆其说，所以有媒体来采访的时

候就发挥一通：“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们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叫“同代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我的“蛊惑”，诸位可以去找这个公众号来看一看。

最近我就反省，这个回答的前提有问题。就是说，我把“同代人”这个概念，缩小到“同龄人”，不自觉地沿用了现在不证自明的标签——“70后”“80后”“90后”“00后”。我记得洪子诚老师有一次很委屈地说：我的书为什么不能摆在一个“‘30后’学者丛书”里去呢？那么，我和温儒敏老师也可以说：欸，咱们弄一个“‘40后’学者丛书”，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书收进去呢？好像没有人敢做这样的策划。以出生年龄作为划分作家的标签极不靠谱。当年我们如果要划分作家的“代”的话，是以“出道的时间”来划分的。比如说谌容，80年代以《人到中年》这个作品出道，她的儿子梁左和我们是同班同学，一个宿舍的。我们同班同学陈建功，跟着梁左，应该叫谌容阿姨，但他是和谌容同时出道的“八十年代北京作家”，所以他遇见谌容的时候，不知道叫她什么好。以“出道时间”来划分作家是有道理的。

现在是看你的出生证。这些出生证虽然可以证明大家是一个年代的作家，其实千差万别，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完全没有一个基准，除了出生证那个标签之外。我知道有些作家很抗拒把他归到什么“70后”“80后”里头。所以说，把“同时代人”缩减到“同龄人”这个概念是很狭窄的，背后根深蒂固的是进化论与时俱进的“时间意识形态”在作怪。

我最近读了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一些文章，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什么叫同时代人》，还有一个译法是“什么叫当代人”，探讨人和时代的关系，探讨我们作者或者文学批评家怎样进入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时代里怎样去发出我们的声音。这个文本对我的启发很大，造就了我自我反省的可能。

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界定至少有三点可以参考：第一点，所谓同时代人，或者当代人，是用尼采的那个概念——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代人，一方面他是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但他又是不合时宜的人，所以他跟时代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他既属于这个时代，但是又不断地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这种人才叫作同时代人。如果你紧贴时代，顺应时代，不假思索地以出生证证明自己的当代性，那你就错了。不合时宜是非常重要的点。阿甘本说，不合时宜是什么意思呢，他跟自己的时代有一种歧异关系，这种关系依附于时代同时又跟它保持距离，这种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者时代的错